大学环境下大学出版社的融合发展探讨

李忆泠
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，上海 200001）

摘 要：本文基于对大学出版业的脉络梳理，针对我国大学出版社受困于数字化进程的情况，探讨大学出版社在其所属大学环境下的发展新态势。

关键词：大学出版；数字化；建立信息联结；拓宽方式；教学资源传播 **中图分类号：**G239.22 **文献标识码：**A
文章编号：1671-0134（2021）12-125-03 DOI：10.19483/j.cnki.11-4653/n.2021.12.040
本文著录格式：李忆泠．大学环境下大学出版社的融合发展探讨 [J]. 中国传媒科技，2021（12）：125-126，131.

后疫情时代，并非简单的“疫情之后”一意，而是在度过疫情的日子里，包含其中所发生的变化、面临的挑战、有过的思考等。面对新冠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现状，大学出版社似乎应当寻求、开拓更多的发展态势，以应对未来的考验。

大学出版社是本文研究对象，通过对大学出版业的脉络梳理，针对大学出版社数字化发展的窘境，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为依据，探讨大学出版社在其所属大学环境下的发展新态势。

1. 大学出版业概况

大学出版社自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成立，顺应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与需要，依托于各院校学术地位和品牌基础逐渐成长。1986 年，大学出版社在中宣部指导下，伴随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的召开，制定了《高等学校出版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。该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地位、性质、任务和发展方针，是我国大学出版业的纲领性文件，标志着初创期的基本结束。而后的十几年，大学出版社一改创设初期的步履蹒跚，迅速发展壮大，逐步在不同学科领域深耕，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和优势。到如今，我国共有大学出版社 114 家，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 19.5%，已然成为我国出版业中颇具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由于大学出版社与其所属院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，故发展脉络也与院校学科建设的步伐息息相关。现代学科初创期借助出版业进行了学科的积累与建构，大到论著、丛书、教材，小至教辅、习题等，无不鲜明地体现了大学出版业的功能指向。[1] 而其后学科发展趋于稳固，又因 2007 年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《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将其转为企业制后，大学出版业的情势开始发生变化。一方面由于图书素材的积累、高等教育的影响、阅读人群和范围的扩大，另一方面受限于改制后出版经营的收益与管理，前者对图书、主题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后者对出版环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大学出版社已不再只是从前的功能身份，在开辟更多受众群体的同时，也在慢慢立足特点优势和品牌优势的建设，扩大发展与影响。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的“音乐上海学”系列丛书，紧紧抓住了“音乐”与“上海”这两个得天独厚的元素，巧妙地发挥了上海音乐学院在音乐学这一“一流学科建设”的能动作用；又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教育科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《5 年高考 3 年模拟》，充分利用两家出版社所具备的天然的资源、人才合作优势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依然被称为是高考学子必备的一本“奇书①”。

纵然大学出版社确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一些客观优势的存在，但在这场疫情的见证下，它也显露出较为薄弱的一面。这一面恰恰又是长远发展下，大学出版社乃至整个出版行业都需要做出改变与适应的地方。

2. 大学出版社数字化发展窘境

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，传统出版产业链在经受严重冲击的考验后，暴露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，我国大学出版社大多数字出版积累薄弱、形式单一，无法面对和适应变动的局面，面对大难显得有些许束手无策。而这个时候，恰恰是小部分不失时机在当下即刻推出数字化阅读的大学出版社，非常从容地应对了此次危机。

固然在非常时期，各大学出版社集思广益做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，例如推出作者讲解、教学视频；举行线上群组直播讨论等，但这些内容对于在线资源建设来说只是一隅，而事实上，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。从数据上看，“在大学出版社中，数字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不到 1% 的占比 52.54%，占总销售收入 1% ～ 10% 的占比 44%，两者相加占比高达 96%”[2]（引自“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2019 年年会”《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转型调查结果分析》报告）。这一数据非常直观地摊开了大学出版社薄弱之处的根本症结所在，产品营收之低，使得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开展举步维艰。而从形式上看，大学出版社的数字产品大多与传统出版物绑在一起，只是阅读的方式或是呈现形式有所不同，难以称之为数字产品，故也无法脱离传统出版性质的附庸，形成独立的资本积累。

实际上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并辅以资金支持推动数字出版的进程，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非常理想的形势

出现。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新冠疫情催生出的“融合媒体”这一说就此诞生。20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强调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，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、先进技术为支撑、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”。与此同时，抗疫期间高校全面线上课程的推出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做的《应对危机、化危为机、主动求变，做好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及课程资源建设》的主题报告，强调“各类教学资源有力支撑高校教学”这一举措，也在强有力地推动着大学出版业内容融合媒体发展的脚步。

“融合媒体发展”兴许能给数字出版另辟一条适宜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新路径。

3. 大学环境下出版物融合发展探讨

在阐述我国大学出版社现状后，就学术类、工具书类、教育教学类三类出版物，在充分发挥大学环境的优势下，如何使得内容资源融合发展，探讨一二。

3.1 共享学术资源成果，建立信息联结

此思路受启发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“牛津学术在线”（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）。2003年的研究数据显示，其收录了700多篇各学科学术文章，并计划每年逐步增多，并且可随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其他电子图书和期刊链接（王跃《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研究》）。该产品形象迁移至我国较为常用的文章检索网站可联想到中国知网、万方、维普等。以中国知网为例，虽其收录面甚广、学科之全面，作为知识基础设施来说，确实为大型数据库，但针对各大学学科、学术前沿成果关联颇远。

每个大学出版社实际上都有各学科成果集结形式的出版物，通常冠以“论文集”“手册”出现。该类出版物与期刊的性质颇为相似，具有一定的汇编价值、有某种共同的属性、互相之间能形成一定的关联。部分大学在成立出版社的同时，成立了期刊社，但这两个部门在每个大学的设置都是有所不同的，有些同属一个源头，资源互通有无，有些独立为两个部门，并不资源共享，信息之间就此断裂。[3]

遵照“牛津学术在线”的逻辑，假设各大学出版社与期刊社将同类学科内容资料归纳、整理，做一链接，其搜索便极具“专”科性的针对性了。在充分开发出版物增值价值的同时，也使得学术资源被最大化地整理与收集。事实上这种操作手段已雏形于我国各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，可以非常普遍地看到它们在新书推广中使用二维码、超链接的形式关联同类或同系列的产品，但该辐射范围较小，无法形成具有系统化意义的检索功能。[4]

当然，借鉴也需结合实际情况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这一网络产品因其与出版商、运营商等一些服务器之间关联颇深，在便捷使用者的同时，也显示了其耗资巨大的现实基础，就我国大学出版业的经济状况来讲，无法做到完全复制。那么，如何“联结”便是一件值得学习的事情了。比方如何设置搜索与链接；如何进行信息交换的访问；其中无成本支出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……

3.2 拓宽工具使用方式，增强检索针对性

这里的“工具”所指包括检索、参考等功能在内，具有“工具”内涵的所有书籍，并不仅囿于辞典、翻译对照的范畴。

即便是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搜索引擎逐渐代替工具书的功用成为新时代信息搜集、检索的普遍方式，但就严谨的学术研究而言，工具书仍然作为对知识整理序化的工具，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。多年以来，大学出版社都在积极出版或引进出版各种学科“专”用类辞典，但也不免由其他出版社抢占了先机，比方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的《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》。这是一本百科全书性质的音乐辞典，无数学者称其为音乐百科全书出版史上的里程碑，卷帙浩繁，售价高达数千元，但发行数年尚未出版电子阅读载体的形式。即便是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学科类专用工具书，诸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“总谱读法”系列，囊括弦乐、管乐、声乐所涉符号标记的详细解读，目前也仅限于传统而古老的纸质图书的流通。

参考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具书数字化进程，其数字化工具产品不仅包含原来纸质工具书的数字化，还有一些新的创意产品。除牛津英语词典在线（OED）、牛津词典在线（ODO）、牛津双语词典在线（OLDO）外，牛津工具书（Oxford Reference）、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（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）、Who’s who and Who Was Who Online 等的增加，极大地充实了数据库存，使得检索更具针对性。

以上所列产品固然也存在资金层面的各种问题，且不讨论，以下仅从我国大学已提供的资源环境来讲，每个大学都配备图书馆，有着一定程度的检索功能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大学出版社可以将工具类出版物以某种方式授予图书馆使用，借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运营模式，或许可为工具书拓展出更多的使用可能和流通可能。

3.3 支持教学资源传播，优化教学活动

教育有其宗旨和功能，通过教学的手段，围绕学科与课程展开。教学涉及学科设置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方法、教学评价、教学实践等一系列过程，通过教学目的的达成，从而实现教育的意义。其中，教学资源作为满足教学的基本要素和条件，是实现教学目标，优化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。[5-6]

现代社会发展，“资源”是任何社会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，教学也不例外，且大学环境下的知识体系，各学科、专业有着逻辑而严密的独立与关联，教学资源更具重要意义。疫情虽是一场灾难，但抗疫期间网络课程的推行，倒是给教学资源传播提供了参考。

提及网络课程，不免想到教育出版数字化发展领先的牛津大学出版社、剑桥大学出版社。这两个大学出版社都完备了在线资源中心，一方面为教师提供配合课本的教学资源，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工具。用户

（下转第131页）